

李春棠 著

坊墙倒塌以后

宋代城市生活长卷

湖南

2.81

江

李春棠 著

坊墙倒塌以后

宋代城市生活长卷

湖南出版社

〔湘〕新登字001号

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

李春棠 著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199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226000 印数：1—3000

ISBN7—5438—0517—0

K·85 定价：6.25元

目 录

卷前语 (1)

首卷

从冷漠中走出 (5)

甲编

樊楼灯火 (18)

名牌, 宋五嫂鱼羹 (32)

黄金、牡丹与快乐仙宫 (45)

多采的服务市场 (58)

乙编

最显赫的家族 (71)

高超的平衡游戏 (89)

后宫微澜 (104)

丙编

走入社会之前 (120)

敬神与造神 (136)

庙会与术士 (154)

艺术，拥抱大众 (168)

市民爱憎的抒发 (180)

丁编

快节奏的欢愉 (193)

美的争夺 (208)

男人与女人的组合 (223)

红颜多薄命 (245)

黑道 (259)

没有被遗忘的角落 (269)

卷前语

街市上一片灰黑穿着的日子，早已过去了。如今，人们的服饰千姿百态，色彩纷呈。更可喜的是，再没有人为此写杂文、上广播，大发有伤风化的感叹。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社会文化的需求也必然不断地上升、扩展。

历史学，属于高层次文化。然而它并不远离社会大众的视野。因为它面对的就是社会生活，是永无穷尽的昨天的社会生活。尽管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特殊的生活规范与特殊的运行规律，但是昨天与今天之间毕竟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许多正反、成败与悲喜的历史过程，许多真伪、善恶与美丑的历史比较，都能够为后人所理解和借鉴。所以人们从垂髫时代起，就开始在历史大观园里探游。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越高，“闲暇”越富有，人们猎取历史知识的兴趣就越浓烈。早些年，在香港闹市的缝隙间营筑了一座袖珍式的“宋城”，后来，在古都开封又开辟了一条更宋代化的“宋街”。有的人去北京八达岭体验一番长城的历史氛围，觉得还不过瘾，竟要沿着长城全线去访古探幽。可见，在现代人们的生活情趣之中，探寻历史的奥秘，领略历史生活的风情，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历史学如何适应这种正在升高的社会文化需求呢？

有的学者正在写作实践中探索新的路子。笔者也常常与一些同行讨论这个问题。看来，除了拓宽研究领域以外，更新研究方

法、寻找新的写作形式，也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传统的史学方法，反映了历代不同阶段的水平，也留下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and 启迪。近 40 年来，我们学习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方法论，逐渐地走出了旧的传统，但是，走得并不轻松。许多隐含历史惰性的习惯、观念，还紧紧地缠绕着我们。有一种观念以为，只有在狭小专业沙龙中醇浓慢啜的著述才是学问。这就是把历史学引进狭巷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种以为挤干了“水分”的朴学才是真学问的观念，往往使文章写得枯涩、滞板，如同城隍庙里的坐偶，生趣阙如。本文作为一个小序，不能专此深论。

为什么不能向司马迁学习，把一部究天人之际的宏篇巨制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推向更广阔的社会呢？当今之际，至少在写作形式上必须结束那种单调的、乏味的“灰黑农妆”时代，体裁、手法都应逐渐地丰富起来，使史学园苑也出现千姿百态、色彩纷呈的景象。

出于这种期愿，笔者愿意努力一试，希望学术性的历史选题也能步入较多的读者的生活。于是，在写作方法上力求有所更张。既不能单纯依仗枯涩的逻辑论证，也不能停留在历史现象的平面铺叙，而是试图做到，历史逻辑的阐发相映于历史画面的流动之中。其实，这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而是需要使丰沃的历史生活的美，得到适当的艺术表现。在这里，艺术的成份不是装饰，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可读性，而应该是尽可能使历史生活本身的美，表现得更鲜明、更真切一些。那末这种写作形式属于什么体裁？当然不是正襟危坐的专论，不是述而不作的记事，也不是浅平简介的史话，更不是松散飘逸的随笔。它，或许兼而有之，于是成了一种穿上随和、宽松、轻便妆着的读物。

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大众文化需求的支撑点也会逐步向高坡移动。不能老以为，大众需要的历史性读物，总是

“杨家将”。我们必须寻觅介于大礼服与情侣衫之间的多式样的赏心悦目的妆着。

写人物生平与朝代兴衰，也许更有利于探寻新的路子。可是笔者选择了辐射方位极广、球体式的城市生活。

最近半个世纪，城市的发展突飞猛进，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生齿最繁，人口基数比许多西方国家大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要使众多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那是一个艰难得很的浩大工程。可是受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的催发，城市人口也达到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甚至将近三分之一。1984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31.9%（《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原有的城镇飞速发展，新兴的城镇如雨后春笋勃起。

城市的发展，全方位地牵动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衣食住行、工作学习、休闲娱乐都在变，一些传统的关系、传统的观念也在变。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关注起城市本身的变迁。

其实，城市只是一个历史的过客。在漫长的原始时代，人类奔突在莽莽榛榛的荒原上，没有城市。在遥远的未来，当高技术装备了各个领域，城市与乡村的差别逐渐淡化、消失，城市也就消失了。然而城市这个历史过客，至关重要。它负载着人类文明，乘风破浪，航行了几千年，它的每个历史脚印，就是每个时代的缩影。

我国城市的起源与流变，是一部充满神奇色彩的历史。这里，我们只摘取了两宋时期（公元960年~1279年）这个片断进行考察。这300年间的城市发展，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历史阶段。各种历史的力量在相互冲撞碰击，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异、断裂，异采纷呈，富有魅力。历史在随着奔竞的脚步向前走。这也是本书捕捉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我们把笔触伸向了宋代城市的经济、文化、民俗以及政治等各个领域，企图展现一幅连缀的生活长卷。然而，这并非要对所有的部位进行全面扫

描。

理想的目标，从来就不能一蹴而就。笔者乐于作一颗问路的投石。但愿有更多的人走出新路。

从冷漠中走出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次大变，
城市内部限制居民自由的坊墙，在北宋时
期彻底崩塌了。

1

10 世纪后期至 12 世纪初，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不在黑暗的欧洲，不在酣睡的美洲，也不在尼罗河、恒河以及两河流域那些曾经拥有过古老文明的地方，而是在滔滔黄河的下游南岸。它就是我国北宋王朝的首都东京开封，也有人称它为汴京。这个会萃了 100 多万人口的巨大社区，以“惊人耳目”、“长人精神”的无穷魅力（《东京梦华录·序》），屹立于时代文明之巅。

沉缅于享乐安逸的北宋王朝，后来被女真贵族的拐子马踏碎了。12 世纪前叶至 13 世纪后叶，位于钱塘江口的杭州，作为南宋王朝的首都临安，取代了开封的地位，成了天下第一大城市。历史上声名最著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威尼斯来到东方。他亲自领略了杭州的风采之后，便以极大的热情赞美这个“堪为世界城市之冠”的“天城”，称之为“令人心旷神怡熏熏欲醉”的人

间天堂。（《马可波罗游记》第76章）

两宋300年间，东京、临安这两个超级城市，人口的高峰都远远超过了100万大关。风光旖旎的苏州、富饶锦绣的成都、位于南北东西交叉口上的交通枢纽鄂州（包括南市）以及濒临蓝色大海的巨港泉州，其居民数量也先后跳跃到40万、50万的水平线上。此外，北宋的西京洛阳、北京大名、长江岸边的江宁（南宋叫建康）、湘江之畔的潭州、东南沿海的福州、广州等，一批古老而又有新发展的城市，其居民数量也都达到过10万以上或者更多。

至于人口在1万至10万之间的城市，北宋不会少于100个。如宿州城，建隆元年一场大火灾就烧了民舍万余区。受灾人口就有几万（《宋史》卷63）。开宝七年，亳州永城县城火灾，烧民舍1800余区。人口在1万以下的城镇，总数大约3000个。

美国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L·沃思，把城市区分为6大类，再细区分约20种（《城市社会学》第10章）。宋代城市当然不可能有如此繁细的类型。就它们的基本功能而言，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县以上政权机构所在的城市。它们是一个政治隶属关系的城市系列。但其中大多数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城市。另一类是以工商活动为基本特征的镇集。它们不可能超脱于封建统治，但又不是封建政权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层次。它们的存在，不是政治上的需要，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2

县以上的政治隶属城市有多少？

根据《元丰九域志》的记载，北宋神宗时，全国行政区划为：

京府 4，次府 10，州 238，军 37，监 4，县 1135，州所辖监 30。^①

但并不是各级政权所在地都是城市。广南西路昭州的昭平县，县治在漓江岸畔的荆棘丛中。这里“止有三家茅屋及一县衙，真所谓三家市也。有舟人登岸饮酒，遂宿茅屋家。夜半，觉门外托托有声。主人戒之曰：‘毋开门，此虎也。’奴起而视之，乃一乳虎将数子以行。”（《岭外代答》卷 10）当然，这种极为荒凉的县治，只是边远地区的特殊情况，绝大多数县以上政府所在地都是城市。

在统计县（或相当县）以上城市时，有几个情况必须注意：

第一，一般情况下，府治、州治、军治所在的城市与一个县治重叠。如太原府治与阳曲县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

第二，有 13 个州府城市重叠两个县治。如东京开封府重叠着开封县治与祥符县治。

第三，有 11 个军州监城市没有与县治重叠。例如秦凤路的岷州、兰州等城市没有县衙。

考虑以上三个情况，当时县（或相当县）以上城市应为：

$$1135（县）-13+11+30（州辖监）=1163$$

除了极少数像昭平县那样的，县以上城市总量至少在 1150 个以上。当然，这是个不稳定的量，到了北宋晚年，县以上城市，至少在 1200 个以上。

工商业镇集有多少？

关于北宋小镇的数量，笔者曾根据清代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印冯集梧校订的《元丰九域志》统计，熙宁元丰间共有 1884 镇。这个意见写在 1983 年第一期《湖南师院学报》《宋代小市场的勃兴及其主要历史价值》一文之中。1984 年，《元丰九域志》王文楚、

^① 这些数字是根据王文楚、魏嵩山点校的《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 1984 年出版）再次统计的。与书中王存所写的《表》的统计数略有出入。

魏嵩山点校本出版，笔者根据这个本子再次统计，小镇总数为1880个。不过，关于镇的记载，此书仍有遗漏。当时小镇总数肯定突破1900个。

南宋没有镇的全面统计材料。总的来说，南宋商品货币的活动并没有比北宋减弱，镇的发展状况，不会在北宋的基础上倒退。姑且以1900个镇扣除金王朝所占地区的小镇数量，南宋小镇的总量，至少有一千二三百个。

关于集市。宋代一般简称市。北方多称草市；南方，有的称墟市，有的叫步，也有叫草市的。少数的集市，颇具规模，如荆湖南路的储州市，可以与大县城匹敌。但一般集市是比镇更小的社区，它们处于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形态。

根据《咸淳临安志》、《景定建康志》、《宝庆四明志》和《嘉定赤城志》等地方志的记载，估计南宋有4000多个集市，从而推测北宋的集市大约有五六千个。

在自然经济居于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宋王朝的统治域内，涌现了如此众多的城镇集市，正是宋代城市发展的一种主要表现。

3

就城市的数量规模而言，大宋帝国不仅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而且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国家和地区。例如11世纪的俄罗斯地区共有86个城市，13世纪达到250个。最大的城市基辅不过数万人。还有将近10个大城市，人口只有1万到2万。11~13世纪，西欧城市的居民数量，一般是0.5万至1万人。直到16、17世纪，拥有4万人口的伦敦，就已经是个庞然大物了。

对于宋代城市发展水平最能作出真切比较的，还是马可波罗。他来自西欧，又被忽必烈任命当了3年扬州总督。他还风尘仆仆，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城镇。这位威尼斯商人的儿子，用欧洲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城市，对比度更加明晰。他到了苏州，就说：“苏州城，漂亮得惊人。”“这里人口众多，稠密得令人吃惊。”就连二三

流的城市襄阳，他也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一个相当大的商业重镇”。（《马可波罗游记》第75章、70章）

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一二万人的城市已经很大了，三四万人口的城市，就大得出奇。当他来到四五十万人口的苏州，怎能不惊得目瞪口呆！到了临安，他简直要晕倒了。因为当时西方人心目中的天堂，绝对不会有这般气派。

城市，是人口、财富、智慧与享乐的集中。它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生息地，又是文明的主要载体。文明不喜欢鲁宾逊离群索居式的孤独飘流，也不大欣赏平静绿洲上的牧歌生活。它爱交流，爱竞争，爱嬉闹，爱冲撞。越是在相互依赖、相互砥砺、相互角逐的关系之中，它越能焕发精神，越能发展自己。

宋代成千成千的大小城市，不再是一些沉寂的政治孤堡，它们通过商品与文化的纽带，联结着，奔竞着，像一只庞大的船队，遥遥领先地驱驰在人类历史的征途上。

4

如璀璨群星的宋代城市，其内部的风貌如何？我们以北宋东京开封城作为考察的主要对象，因为首都是戴在帝国头上的皇冠。

公元前3—4世纪，这个处在“四战之地”缺少屏障的古老城市，是魏国的都城大梁。经过千百年岁月的撞击与改造，它延续下来。到了五代（公元907—960年），特殊的历史机遇，使它先后成了后梁、后汉、后晋与后周4个局促而短暂王朝的都城。宋太祖赵匡胤在一场戏剧性的兵变中，仓促地抢夺了皇位。当时有人建议把都城迁到长安、洛阳。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决定继续以开封城作为帝国的首脑都市。

宋代，除首都东京以外，还设立3个陪都：西京洛阳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

东京，居住着以皇帝为首的庞大的权力集团。他们把持一个十分完备的庞大的官僚机器，卵翼着一个异常肥大的分享特权与

安乐的寄生阶层。因此，供养和保护帝室龙种、王公贵胄、高官大宦以及他们成群的嫔妃妻妾、成群的子孙苗裔，便是个头等大事。至于居住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官符的富家巨室，自然也必须考虑满足他们享受性的消费需要与安全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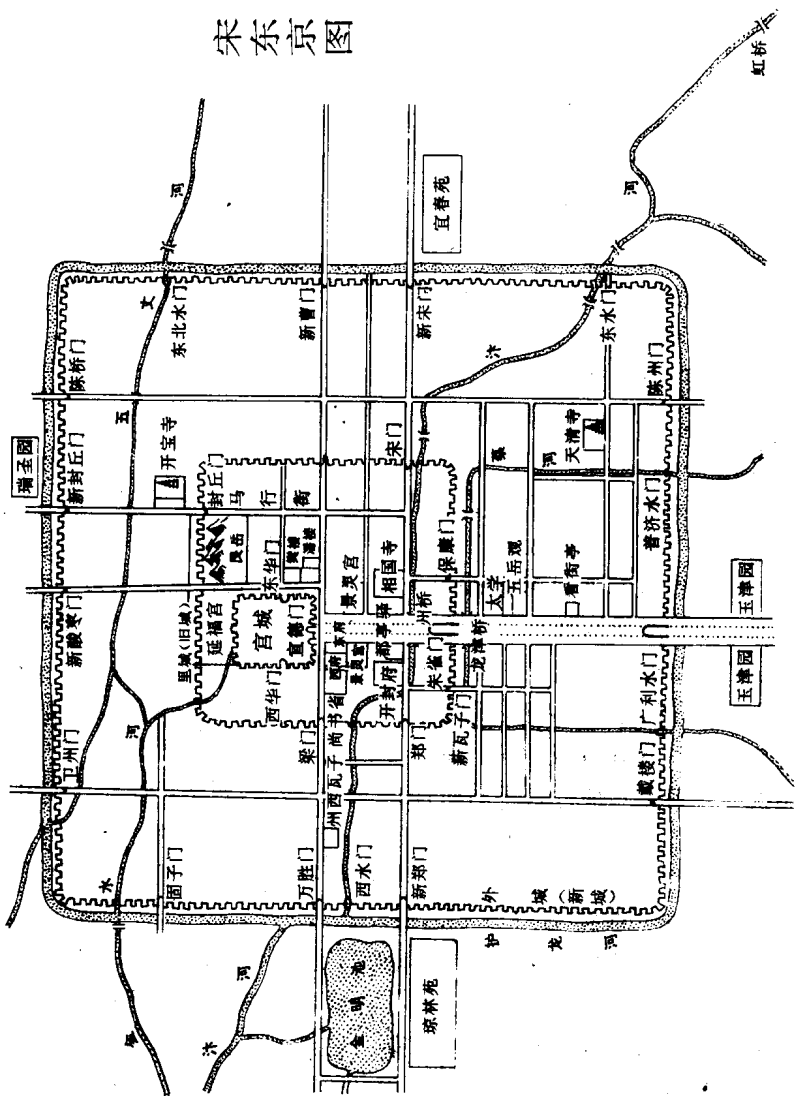
对于安全问题，限于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修筑固若金汤的高大城墙与护城壕沟。这一点，赵匡胤不必从头做起。东京城就像大围子套小围子、小围子套细围子，已经有了3层城墙。最里层是环护皇宫的皇城，周长5里，折今2300米。中间一层叫子城、牙城，又叫内城，周长20里，折今9200米。后梁、后晋、后汉的君主们，乃至后周的开国君主郭威，都在这个狭小的城池里，将就地做皇帝，气势颇为局促。到了后周世宗柴荣时代，因他是一个颇具开拓精神的君主，政治上、军事上都有所作为，就为这个拥挤不堪的京都再筑了一层外城，又叫罗城、新城，周长48里232步，折今22436米。

对于这3层城墙，北宋时虽然累加修葺，却没有大事扩展。神宗元丰元年，费了400多万个工，外城增长也不到2里。直到北宋晚年，打算再筑一道更大的外城，周长80里。但还没来得及仔细筹划，风云突变，就把这个动念吹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市区的扩大已成为事实。

自唐代以来，南方农产品的输送，已成了帝国首都长安的生命线。由于供应上的不便，致使武则天、唐明皇这些颇有头脑的君主，不断地走出函谷关，到东边洛阳来过日子。最明显的好处是可以节省一大笔运输费用。宋太祖在这一点上算盘打得更精，连洛阳也不去，选择了开封。

通过汴河、蔡河、五丈河与广济河（又叫金水河）4条动脉，调集各地物资，每年从南方运送到东京的粮食高达600多万石。加上附近农村送来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数量十分可观。各地的特产佳品，又源源不断向这里输送，真是“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

宋东京图



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东京梦华录·序》）特权阶层、富裕阶层的胃口，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

5

东京外城总共开了 13 座城门（包括水门），东南西北 4 面的正门分别叫：“新宋门”、“南薰门”、“新郑门”与“新封丘门”。皇帝为了表现自己的至高无上，出出进进只走 4 张正门，称为“御道”。

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居住建筑的最佳模式是坐北朝南。除了契丹族辽朝君主们坐西朝东以外，中原王朝的帝王们都接受坐北朝南的模式。他们高坐在金銮殿上，面朝南方，于是获得“南面之尊”的雅号。那末东京这 4 张正门，最为气派的自然数南薰门了。

进了南薰门，往北走，穿过内城的朱雀门直达皇城的宣德门，纵列着一条笔直而宽大的“御街”，极为壮观。御街全长七八里，宽 200 余步（其他大街宽 30 步）。1 步 5 尺，御街宽度则为 1000 多尺，根据吴承洛推算，宋代 1 尺相当 30.72 厘米，那末，御街最少有 307 米宽。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特大型号的街道。

“御”者，皇帝专用之谓也。这条御街十分鲜明地表现了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等级秩序。街中心的“御道”，供皇帝专用，一般情况下，禁止其他行人车马通行。“御道”左右两侧，各有一条用砖石排砌的“御沟”。沟里植种莲荷，沟岸边交错地栽种桃、李、梨、杏。御沟之外，安装了一排红漆栏杆，划出了左右两条人行车马道，叫“御廊”。

一条 300 米宽的御街，就分割成了水陆 5 股，其中 3 股陆道，都是堂而皇之的交通大道，显出了帝国的赫赫威严。御廊边上就是临街的店铺、民居以及有关官署。在这些店铺民居之前，还有杂错的摊棚，商贩们十分活跃，而且逐渐地向御廊深里浸入。直到北宋最后 10 多年，才下令禁止在御廊中设摊交易。并且又布设